

Xinhua Wenzhai 1979-2013
Wenxue Zuopin yu Pinglun Yanjiu



《新华文摘》

(1979-2013)

文学作品与评论研究

李宗刚 / 等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新华文摘》（1979—2013） 文学作品与评论研究

Xinhua Wenzhai 1979—2013 Wenxue Zuopin yu Pinglun Yanjiu

李宗刚 田任云 著
余琼 冯瑞琳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华文摘》(1979~2013) 文学作品与评论研究/
李宗刚等著.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209-09450-4

I. ①新… II. ①李… III. ①文艺评论—中国—
文集 IV. ①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10557号

《新华文摘》(1979~2013) 文学作品与评论研究
李宗刚 等著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 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914
市场部 (0531) 82098027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印 装 青岛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16开 (169mm×239mm)
印 张 34.5
字 数 550千字
版 次 2015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2月第1次
ISBN 978-7-209-09450-4
定 价 8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目 录

绪论 从中心走向边缘

——《新华文摘》(1979-2013)文学作品与评论研究 (001)

上编 1980 年代《新华文摘》文学作品与评论研究

引言 (031)

第一章 《新华文摘》文学作品与评论栏目建构 (034)

第一节 文学作品选编 (034)

第二节 评论栏目的专题策划 (041)

第三节 文学作品与评论的特殊地位 (052)

第二章 《新华文摘》文学作品与评论的特点 (056)

第一节 选载取向 (056)

第二节 关注文学热点 (061)

第三节 品牌铸造 (068)

第三章 《新华文摘》文学作品与评论特点的形成原因 (078)

第一节 1980 年代的文学环境 (078)

第二节 创刊及定位 (081)

第四章 《新华文摘》文学作品与评论的影响 (086)

第一节 参与文学传播 (087)

第二节 时代精神的彰显	(094)
结语	(100)
附录:1980年代《新华文摘》期刊来源数据表	(101)

中编 1990年代《新华文摘》文学作品与评论研究

引言	(137)
第五章 市场经济时代《新华文摘》选刊策略	(138)
第一节 市场经济时代之处境	(138)
第二节 市场经济时代的选刊运营	(141)
第三节 市场经济时代的选文策略	(145)
第六章 彰显主旋律的选刊取向	(149)
第一节 对“获奖征文大联展”的青睐	(150)
第二节 对报告文学关注的几点变化	(154)
第三节 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坚守	(158)
第七章 《新华文摘》对商业化写作的疏离与接纳	(164)
第一节 对商业化写作的疏离	(164)
第二节 对商业化写作的接纳	(169)
第八章 市场经济时代《新华文摘》对文学思潮的关注与引领	(175)
第一节 选摘“纯文学”作品与评论的几个特征	(175)
第二节 对“文学的命名”的关注	(180)
第三节 对“人文精神讨论”的关注	(183)
结语	(187)
附录:1990年代《新华文摘》期刊来源数据表	(190)

下编 新世纪《新华文摘》文学作品与评论研究

引言	(205)
第九章 新世纪《新华文摘》与文艺专栏概观	(206)
第一节 新变	
——以 2004 年的改版为中心	(206)
第二节 文艺专栏在改版中稳中应变	(208)
第十章 主流趣味的延续与坚守	(218)
第一节 积极宣传党的文艺政策	(219)
第二节 大力推介主旋律文学作品	(222)
第三节 如实反映社会现实	(224)
第十一章 多元文学的接纳与包容	(230)
第一节 对多元文本的兼收并蓄	(230)
第二节 文学批评:在争鸣中趋于理性	(234)
第三节 审美包容性考辨	(239)
第十二章 新世纪《新华文摘》文学选编的意义	(242)
第一节 对新世纪文学的广泛传播	(243)
第二节 对新世纪文学思潮的呼应	
——以“底层文学”“官场文学”为中心的考察	(246)
结语	(249)
附录:新世纪《新华文摘》期刊来源数据表	(253)
附录 《新华文摘》(1979—2013)文学作品与评论目录汇编	(289)
后记	(545)

绪论 从中心走向边缘

——《新华文摘》(1979-2013)文学作品与评论研究

《新华文摘》作为一份以文萃摘编为主的大型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性文摘类期刊,其内容涵盖了政治、法律、社会、哲学、经济、管理、历史、教育、文学作品、文艺评论等诸多领域,堪称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我国创办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涵盖面最广、发行量最多的综合性文摘类期刊。要对《新华文摘》进行整体系统的考察,需要先把不同栏目从整体中分离出来,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然后再从整体上进行高屋建瓴的观照。目前,学术界对《新华文摘》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且不说高屋建瓴的观照,单就不同栏目的具体研究来说也没有很好地展开。为了能够推动这一研究的深入,我们拟对《新华文摘》“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这两个属于文学范畴的栏目进行系统梳理和初步探究,由此开启系统全面研究《新华文摘》的序幕。事实上,只有从具体栏目的研究入手,才能为系统的整体研究夯实基础。

—

在本书中,我们所匡定的《新华文摘》指的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在1979年创刊的综合性文摘类期刊,它不同于之前历史上发行的《新华文摘》。早在1945年,山东解放区曾经出版了一份由山东新华书店编辑出版的《新华文摘》。这份期刊从1945年11月20日创刊,到1949年3月30日停刊,一共出版发行了38期。自然,它与我们所研究的《新华文摘》是同名的两份期刊,并没有任何的继承关系。

1949年11月,人民出版社创办了《新华月报》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

一本大型时政文献综合期刊。到了1960年代,人民出版社作为国家最高级别的出版社,除了从事出版之外,还把视野聚焦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并创办了以转载报刊文章为主的文摘类期刊。1962年,人民出版社的编辑范用受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月报》的启发,着手编了一本《新华文萃》试刊号。“《新华文萃》也分政治、经济、学术、文艺、美术、作品、‘读书与出版’、学术论文摘要、报刊文章篇目辑览、科学文化之窗。在文艺栏,选了艾芜的小说、巴金的散文、田汉和郁达夫的旧体诗、丁西林的剧本,美术作品选了华君武的政治讽刺画、杨纳维和黄新波的木刻,还有摄影作品。”^①《新华文萃》的栏目设置和编排方式,直接影响到了后来的《新华文摘》的栏目设置和编排方式,成为《新华文摘》可以追溯的前身。

1979年1月,《新华月报(文摘版)》正式创刊。它突出了“月报”的“文摘”特点,这使得《新华文摘》开始从《新华月报》中分离了出来,成为独立的文摘类期刊。

《新华月报(文摘版)》的创刊,缘于改革开放形势下的思想解放的社会现实需要。《新华月报》编者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设想:“《新华月报》是和新中国同时出世的,今年,也三十周年了。”“回顾既往,《新华月报》出版以来为读者服务,提供报刊资料,可以说作出了一定的贡献。随着形势的发展,现在怎样把这个刊物办得更好一些,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还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有待于我们作进一步的努力。”^②这就是说,随着“形势的发展”,既有的《新华月报》已经无法充分“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他们才会创办一份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的文摘类期刊。显然,这样的重任便赋予了即将创办的《新华文摘》。

1979年,这个时期的“形势”到底有了什么新的“发展”呢?“粉碎了‘四人帮’文化专制统治,我国科学和文艺战线开始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欣欣向荣的新局面,报纸和刊物逐渐增多,《新华月报》的选材也越来越丰富。为了使《新华月报》能够容纳更多的内容,除了增加篇幅,同时在编排上作一改进,把它分编为‘文献版’和‘文摘版’,我们觉得,这样可能更好地适应读者的需要。”^③

① 范用:《从〈新华文萃〉到〈新华文摘〉》,《光明日报》2004年11月25日。

② 《编者的话》,《新华月报(文摘版)》1979年第1期。

③ 《编者的话》,《新华月报(文摘版)》1979年第1期。

这就是说,随着思想解放格局的基本确立,原有的以选载党和国家重要文献资料为主的时政性的《新华月报》“文献版”,已经无法满足这一形势发展的需要,人们迫切需要一份能够集纳诸多报刊之言论精华的文摘类期刊,这份文摘类期刊以选载各类报纸杂志与出版书籍中的文艺作品和学术论文为主,进而适应读者的阅读新需求。正是在此情形下,《新华文摘》应运而生。

《新华月报(文摘版)》创刊后,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试刊两年后,《新华月报(文摘版)》逐渐定型,并于1981年第1期正式更名为《新华文摘》。

《新华文摘》从1979年创刊以来,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先将其划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然后再对每个时期的《新华文摘》文学作品与文学评论进行相对独立的阐释。这样一来,本书在结构上便分为上编、中编和下编,三编分别对应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80年代,其区间为1979年到1989年(从1979年《新华月报(文摘版)》创刊号到1989年《新华文摘》第6期);第二个时期是1990年代,其区间为1989年到2000年(从1989年第7、8期到2000年第12期);第三个时期是新世纪以来,其区间为2001年到2013年(从2001年第1期到2013年第24期)。

按照年代进行划分,最大的挑战在于选择什么时间节点作为不同历史时期的起始点。那么,我们把《新华文摘》这30多年的非凡历程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段,其依据何在呢?

事实上,历史犹如一条河流,在其奔腾前行的过程中,有些主要节点还是改变了历史河流的流向,这由此使历史的发展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点。具体到《新华文摘》这30多年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以下几个节点对《新华文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一,1979年,《新华文摘》的横空出世。严格说来,《新华文摘》的创刊对其自身来说,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没有《新华文摘》创刊这一原点,就谈不上它嗣后30多年的发展历史。那么,《新华文摘》创刊伊始所确立的办刊理念是什么呢?这便是它要“办成‘杂志的杂志’,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浓缩的小型阅览室”^①。正是在这一办刊理念的指导下,《新华文摘》的选编范围才会非常广泛,它不仅包括政治、经济、哲学、社会、历史、管理、教育等诸多社会科学领域的

① 《新华文摘》编辑部:《编者的话》,《新华文摘》1981年第1期。

文章,而且还囊括了美术作品、人物传记、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等人文领域的文章。正因如此,《新华文摘》以“主体转载”、“论点摘编”和“篇目摘取”等多种选编形式,从国内各领域的报刊与书籍中披沙拣金,最终为读者提供了瞭望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与人文现场的平台,这也正是它被誉为“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小百科全书”的缘由。

从《新华月报》到《新华文摘》,它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从《新华文摘》创刊到当下,它又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这前后60多年,恰好使《新华文摘》处于一个历史的主要节点上。中国传统的纪年方式是60年完成一次循环。60年作为一个甲子,在生物学的意义上是有其根据的,那就是人的生命周期经过一个甲子之后,基本上完成了一次轮回,这种情形在医学不发达的传统社会更是如此。在此期间,人从呱呱坠地到融入社会发展的成年人,一般需要30年左右的时间,从30岁左右到60岁,是人参与并影响社会发展的黄金期。在此时期,人不但融入社会之中,而且还参与了社会的发展,甚至在某些情形下还主导了社会的发展。根据这样的运行周期,中国传统社会便有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说法。所以,每当时间循环60年之后,在中国人的眼里就往往意味着一个“改换门庭”的时代再次到来。如果从这样的基点来审视《新华文摘》的发展历程,也可以部分地印证这一观点。当新中国在1949年成立之后,中国人民迎来了毛泽东的新时代。30来年的韶光流逝,一代人的背影渐行渐远,中国人民自然又迎来了一个转折的新节点,那就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导下,中国进入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新时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正是为了更好地适应这一思想解放大潮的需要,人民出版社才决定在编辑出版文献版《新华月报》的基础上,编辑出版《新华月报(文摘版)》,“这样的起点,便决定了《新华文摘》必将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客观地说,30多年来,《新华文摘》的编选者较好地实践了他们设定的办刊理念。多年来,它一直延用着既有的封面版式、板块设计,不断更新着办成“杂志的杂志”的文摘理念,基本上兼顾到了其所选文章的政治性与学术性的平衡,这使其所编选的文章大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编选者也较好地承载起历史所赋予他们的使命,这使其从办刊伊始所确立的历史起点成为后人再三回眸的历史坐标。

其二,1989年,《新华文摘》的自我调整。《新华文摘》从创刊到80年代末,恰是中国从关注政治向关注经济的社会转型期,这既是社会自然发展的历史区

间,也是《新华文摘》发展的阶段性区间。在1980年代,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是思想解放,其大力张扬的是改革开放。改革意味着中国社会还存在着一系列需要变革的方面,尤其是随着思想的解放,人们深刻地反思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认识到桎梏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枷锁正是我们既有的思想观念,因此,思想解放便成为1980年代的社会主潮。至于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等实践层面的改革,还没有进入全面的推进阶段。随着1980年代末的渐行渐远,中国社会再次开始历史转型的航程。客观地说,1980年代,文学进入了鼎盛的历史时期,许多青年作者、青年学者暴得大名——这与1950年代、1960年代乃至1970年代从事文学创作的作者、研究者动辄获罪的情形大不相同。在1980年代,那些从事文学创作的青年作者往往凭借着一部或几部中短篇小说便获得社会盛名,成为文学青年推崇的偶像;那些从事文学研究的青年学者,凭借着一篇或几篇文学评论文章则得到体制的接纳和推崇,成为青年学生追捧的“精神偶像”。

到了1990年代,中国社会的关注点逐渐地从政治改革转移到经济改革。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人们所关注的焦点已经不再是配合经济体制改革的政治改革,也不再是社会改革,而是经济改革。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在经济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大事,像民营经济的兴起、股份制改革、股票上市流通,等等。以经济为中心的大事把1980年代曾经领一时风骚的文学挤到了边缘的位置。如此看来,整个1990年代,作为《新华文摘》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自然又构成了一个迥然区别于1980年代的新阶段,而这个新阶段的分界线,正是1989年。

其三,2001年,《新华文摘》的更新自我。新世纪意味着我们迎来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新时期,这自然也使《新华文摘》进入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本来,公元纪年是诸多纪年方式的一种,它以百年为单位进行递增,与中国传统的纪年方式截然不同。严格说来,中国传统的纪年方式注重甲子循环,自然会使人部分地失却对未来更加美好生活的想象空间,甚至,它还会使人产生惆怅的情思。而公元纪年的方式则不同,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不但是百年递进的终点,而且还是千禧年的起点。回眸过去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从公元纪年开始,人类社会发展呈现出了跨越式的发展特点,这样的历史自然就昭示着即将到来的百年、千禧年将会继续极大地促成人类社会向着更文明、更富足的方向发展。

正是基于这样的情景,自然时序的更替便被人们赋予了更多的心理想象空间。事实也的确如此,一百年前,在危机四伏的专制社会,战败之后的割地赔款是国人永远无法抹去的创伤性记忆。当上个世纪的曙光播撒在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时,人们开始看到民族振兴的希望。斗转星移,当我们站在新世纪的门槛时,中华民族的屈辱得以洗清。香港、澳门相继回归祖国的怀抱;2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已经初步地显示出了勃勃生机。因此,当新世纪的曙光再次照耀大地时,中国人自然有理由对新世纪充满更多的期待,对新的千禧年抱有更多的憧憬,那就是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将属于中国。这样的历史节点,也许会自然地深刻影响到《新华文摘》的办刊理念,并使其在自我更新中求变求新求发展。

以新世纪为界碑,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使得中国越来越深度地融汇到世界的大家庭中。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主办奥运会等一系列重大的事件,便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在全球的既有格局,使其越来越具有世界化的特点。与此相关联,一些社会科学开始逐渐地褪去了意识形态的色彩,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管理学等学科逐步崛起。这些带有“科学”色彩的学科,不仅把文学在1980年代曾经一统天下的格局彻底打破了,而且还把文学在1990年代的先锋文学给边缘化了。在新世纪,文学不再是社会的中心,更不是社会的焦点,而经济学则异军突起。有关经济学的话题,经常引领着一个时期的话语走向。在此情形下,进入新世纪的《新华文摘》的文学作品与文学评论只能节节退守。最后,“文学作品”和“文学研究”栏目逐渐从耀眼的星光泯然为暗淡的萤光,其所占期刊的页码比重甚至在一般栏目之下。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新世纪的到来,自然构成了《新华文摘》“文学作品”和“文学研究”栏目的一个值得关注的节点,这也同样是我们把《新华文摘》30多年的历史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的内在根据。

二

1980年代,在《新华文摘》的栏目中,占据绝对优势的是“文学作品”和“文艺研究”栏目。我们不妨以1981年第1期《新华文摘》为例略加说明。这期《新华文摘》共收入了97篇文章(除去所刊登的美术作品、学术动态、综合报道、论

文提要、补白等栏目),其中,文学作品类的文章有16篇,其所占的比例达到了16.4%;文学评论性的文章便有18篇,其所占的比例达到了18.5%;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类共计占了34.9%。也许,我们单独审视这种情形,还无法判断其显著的文学偏好。如果把这种情形与2012年第24期《新华文摘》进行对比,便可以发现历史的前后面貌竟然相去如此巨大。2012年第24期《新华文摘》载文共有44篇,其中,文学作品有1篇,所占的比例为2.3%;文学评论所占的比例为6.8%;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类的文章共计占了9.1%。通过这组数据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1980年代《新华文摘》的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的篇幅所占的比例之高是超出想象的。

1980年代,文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被赋予了“经国之大业”的使命,成为“不朽之盛事”。与此相对应,这一时期的《新华文摘》对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的转摘,不管是数量还是分量,都异常显赫。可以说,《新华文摘》参与了整个1980年代的文学建构。

《新华文摘》的创刊号,也就是1979年第1期,便转载或转摘了新时期文学的奠基之作——被视为“伤痕文学”的代表性作品《班主任》和《伤痕》。为此,它专门转摘了刘心武的《生活的创作者说:走这条路!》和卢新华的《谈谈我的习作〈伤痕〉》。除此之外,这一期《新华文摘》还重点推介了向彤在1978年11月3日发表于《光明日报》的《文艺要不要反映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从〈伤痕〉谈起》一文。向彤认为:“《伤痕》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悲剧,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社会主义文学,不但可以而且应该反映这些悲剧。”^①这就从理论上回答了伤痕文学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等问题,为伤痕文学的发展铺好了道路。

文学积极参与社会变革,现实主义文学蔚然成为这一时代的文学潮流。1980年代,《新华文摘》对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作家作品是路遥和他的小说《人生》。《新华文摘》在1982年第9期不仅转载了路遥的《人生》(《收获》1982年第3期),而且用了60个页码的篇幅全文转载。这种情形对于以转摘为主的《新华文摘》来讲,实在是不多见的。然而,从《人生》走向《平凡的世界》的路遥,在1980年代中后期以及整个1990年代,

① 《新华文摘》编辑部:《编者的话》,《新华文摘》1979年第1期。

却没有继续引起《新华文摘》编选者的关注。路遥在创作出了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平凡的世界》后,《新华文摘》并没有转摘这部小说,甚至有关的点滴信息也没有在《新华文摘》出现过。这种相对落寞的情形和昔日《人生》的华丽登场相比,不啻天壤之别。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刊发于《花城》1986年第6期,后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出版;《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出版;《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刊发于《黄河》1988年第3期,后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出版。1991年,路遥凭借三卷本的《平凡的世界》,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是,路遥的这部呕心沥血之作在诞生之初并未获得评论界的认可和推崇,相反还被一些批评家视为不适应时代潮流的老一套“恋土”派的创作。对此,路遥的挚友有过这样的回忆:“1986年的冬季,我陪路遥赶到北京,参加《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研讨会。研讨会上,绝大多数评论人士都对作品表示了失望,认为这是一部失败的长篇小说。”很多评论家认为《平凡的世界》相较《人生》而言,是个很大的倒退。呕心沥血创作的一部长篇,居然没有得到“主流”的认可,路遥的心情灰暗到了极点^①。这一回忆说明,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没有获得《新华文摘》的青睐,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带有某种普遍性的文学现象。换言之,在1980年代后期以及整个1990年代,尤其是在市场经济逐渐确立的大背景下,像路遥的这样的作品被认为失却了激动人心的力量,取而代之的是那些有关市场经济以及消费文化的文学作品。从这样的意义上说,贾平凹与路遥的文学作品在《新华文摘》转摘上的“冰火两重天”形成鲜明对比,恰好折射了中国社会在文化转型过程中的某些普遍性、规律性的特点。

早在1980年代,贾平凹也得到了《新华文摘》的关注,这较之路遥要早一些。1980年,贾平凹的《“罪证”》(《人民日报》1980年1月26日)被《新华文摘》1980年第3期转摘。同年,贾平凹的《夏家老太》(《芳草》1980年5期)被《新华文摘》1980年第8期转摘。1984年,贾平凹的《腊月·正月》被《新华文摘》1984年第12期转摘。1988年,贾平凹的《浮躁》故事梗概(《收获》1987年1期)被《新华文摘》1988年第1期转摘。尽管如此,在整个1980年代,贾平凹其人其文的影响力比路遥还是要逊色一些。当然,从转摘的数量上看,路遥的作

^① 王爱忠:《真实纪录作家路遥的一生:身世、婚恋、政治、文学》,2012年11月16日,来源:凤凰网文化综合 <http://culture.ifeng.com/huodong/special/luyao1/>。

品不如贾平凹的作品多,但是,贾平凹被《新华文摘》转摘的所有作品,都无法与路遥的《人生》相提并论——如果贾平凹的文学创作不是完成了自我超越,如果路遥不是过早地退出了文学舞台,我们甚至无法想象,嗣后的贾平凹及其作品的影响力会反超路遥及其作品。这种情形说明,《新华文摘》对作家其人其文的关注并不仅仅是转载与被转载的被动关系,而且是主动地积极建构的关系,即《新华文摘》与作家作品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在1980年代,张贤亮是无法绕开的一个重要作家,他的文学作品得到了社会的强烈关注,其《绿化树》《一个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均曾洛阳纸贵。与此同时,张贤亮的这些作品也得到了《新华文摘》的关注,他的文学作品在当时即有多篇被《新华文摘》转摘。

张贤亮的作品在《新华文摘》的亮相,最早可以追溯到1980年。其早期代表作《灵与肉》(《朔方》1980年第9期)被《新华文摘》1980年第12期转摘。随着张贤亮文学创作的持续发力,从1983年到1986年间,其文学创作都得到了《新华文摘》的关注。据统计,张贤亮共有9篇不同形式的文章被《新华文摘》转摘。这9篇文章分别是《大阪》(《上海文学》1982年第11期)转摘于《新华文摘》1983年第2期、《肖尔布拉克》(《文汇报》1983年第3期)转摘于《新华文摘》1983年第4期、《绿化树》(《十月》1984年第2期)转摘于《新华文摘》1984年第6期、《当代中国作家首先应该是社会主义改革者》(《百花洲》1984年第2期)转摘于《新华文摘》1984年第7期、《关于时代与文学的思考》(1984年8月23日《光明日报》)转摘于《新华文摘》1984年第10期、《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收获》1985年第5期)转摘于《新华文摘》1985年第12期、1986年第1期、《中国当代作家在艺术上的追求》(《朔方》1986年第2期)转摘于《新华文摘》1986年第5期、《请买〈张贤亮自选集〉》(1986年5月12日《文汇报》)转摘于《新华文摘》1986年第7期。如此高频率的亮相于《新华文摘》,在同时代的作家中是不多见的。

如果说路遥、贾平凹和张贤亮与《新华文摘》是相互影响的话,那么,在1980年代走向文学中心的张炜与矫健与《新华文摘》的关系,则说明了作家对文学的终极诉求决定了其受《新华文摘》关注的程度。张炜和矫健是烟台师范专科学校(后改名为鲁东大学)的大学同学,他们同时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并在全国文学界脱颖而出。1983年第5期《新华文摘》,对张炜和矫健具有同等

重要的意义。就在这期《新华文摘》上,他们的名字和作品一同亮相。张炜被《新华文摘》转摘的是其短篇小说《声音》(《山东文学》1982年5期),矫健被《新华文摘》转摘的是其《老霜的苦闷》(《文汇月刊》1982年1期)。尽管这两个青年作家的作品刊发的报刊不同,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在《新华文摘》同一期上的聚首。从《新华文摘》的排版顺序来看,编选者把他们的作品列入“文艺作品”栏目的前列,张炜的小说列在首位,矫健的小说紧随其后。他们的作品一前一后地出现在《新华文摘》的“文艺作品”栏目上,意味着这两个山东作家得到了《新华文摘》编选者的同时关注。也许在这一关注的背后,隐含的是他们所接受的相似的文学教育以及相似的文学道路,使他们的作品具有了某些相似的美学品格。正是这种相似的美学品格,才使他们的作品为编选者揽入《新华文摘》的“文学作品”栏目中。

借着被《新华文摘》编选者关注的东风,张炜的文学创作进入爆发期,由此也开启了他与《新华文摘》的密切关系。张炜的《黑鲨洋》(《文汇月刊》1984年第8期)转摘于《新华文摘》1984年第11期,《一潭清水》(《人民文学》1984年第6期)转摘于《新华文摘》1985年第4期,《秋天的愤怒》(《当代》1985年第4期)转摘于《新华文摘》1986年第2期,《美妙雨夜》(《文汇月刊》1987年第10期)转摘于《新华文摘》1988年第1期,《古船》(《当代》1986年第5期)的故事梗概被《新华文摘》1988年第2期摘编。从1983年到1988年短短6年的时间里,张炜便有6篇小说受到了《新华文摘》的关注和转摘,这种情形在同时期的其他作家中是少见的。

值得关注的是,张炜的《古船》在1986年第5期《当代》刊出后,并没有马上得到《新华文摘》的转摘。在经过一年多的沉寂后,《新华文摘》方对其故事梗概作了介绍。从转摘的字数来看,《新华文摘》所刊出的《古船》的故事梗概尽管不是很多,但就其所表达的意义来看,无疑是巨大的。众所周知,《古船》对中国土地革命的文学书写,拓展了原有的文学书写的领域,主流意识形态自然不会一下子就被接纳。但是,在1980年代思想解放的引领下,《古船》作为对历史反思的一部文学作品,自然与这个时期流行的反思文学作品一同取得了存在的合法性,那就是对“左”的思想的清理和批判,只不过《古船》比那些反思“反右”、“文革”的文学作品走得更远一点罢了。实际上,《古船》依然是在中国革命大框架下对土改历史的书写,且这些书写也未颠覆革命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相反,其书写乃至反思还是站在革命的立场上,是对革命历史进程中泛起的历史沉渣的清理与批判。因此,《古船》这样一部反思之作自然就得到了面世的机缘。在《当代》杂志推出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推出了《古船》单行本。这说明,在审查较为严格的杂志社和出版社,《古船》的政治定性问题已经获得解决,也不存在什么政治上的禁忌,由此,《新华文摘》对其给予必要的关注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如果说张炜其人其文备受《新华文摘》关注的话,那么矫健其人其文尽管依然得到《新华文摘》的关注,但势头已经不再强劲了。矫健的《老人仓》(《文汇报月刊》1984年第5期)被《新华文摘》1984年第8期转载,《古树》(《解放军文艺》1986年11期)被《新华文摘》1987年第3期转摘,《在历史的连接点上》(《朔方》1989年第1期)被《新华文摘》1989年第4期转摘。从1983年到1989年这7年的时间里,矫健的作品被《新华文摘》转载4篇。至于整个1990年代,矫健因为“下海”投身于市场经济而远离了文学创作。这种情形直到2003年才有所改变。矫健的《金融街》(《时代文学》2003年第5期)被《新华文摘》2004年第1期转摘。实际上,许多作家在走向市场经济之后,其生活积累更加丰厚,这本该有利于文学创作向生活的纵深处拓展,但遗憾的是,我们再没有看到他们创作出更厚重的文学作品。自然,他们和《新华文摘》的关系便不再如当初一样密切了。

在1980年代,《新华文摘》除了担当起文学之外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等诸多使命之外,还开始了其向文学自身回归的历程。这表现在它对具有探索意义的文学作品的选摘上,其代表便是莫言的《红高粱》。

莫言其人其文与《新华文摘》结下不解之缘的时间,较之同龄作家要晚一点。但是,莫言一旦为《新华文摘》所关注,其呈现出来的势头是强劲的。1986年,对莫言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年份。1986年第7期《新华文摘》转载了莫言的《红高粱》(《人民文学》1986年第3期),1986年第8期《新华文摘》转载了莫言的《断手》(《北京文学》1986年第3期)。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发表于1986年第3期《人民文学》。作品一经发表便受到了文学界的关注,被1986年的《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并夺得当年的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莫言正是凭借小说《红高粱》而跻身有影响力的新时期作家的行列。

在1986年第7期《新华文摘》上,选载的小说除了莫言的《红高粱》之外,还